

# 论莱辛《第五个孩子》的空间意义

□刘玉梅,刘玉红

[摘要] 从现代空间小说特征来看,长篇小说《第五个孩子》在形式上可谓一部空间小说;从福柯关于空间及权力关系的理论看,空间成了暴力的象征,这种暴力可能是压迫的,也可能是叛逆的。由此,实在的空间上升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

[关键词] 莱辛;《第五个孩子》;空间;禁闭;暴力;叛逆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3-01151-04

## On Spatial Meaning in Doris Lessing's *The Fifth Child*

LIU Yu-mei, LIU Yu-ho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pace novel, *The Fifth Child*, in view of its form, can be called a space novel. From Foucault's view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power, space has become an embodiment of violence which may be either oppressive or rebellious. In this way, a physical space grows to be symbolic.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The Fifth Child*; space; imprisonment; violence; rebellion

## 荣

获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女作家。她视野开阔,多才多艺,小说创作涉及“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美苏冷战、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青年暴力等等”。<sup>[1](P283)</sup>长篇小说《第五个孩子》(1989)是她的一部优秀作品,被称为“小经典”,国内对莱辛的研究大都是泛论她创作所涉及的种族问题、女性主义思想和政治关怀等,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多集中在《金色笔记本》、《第十九号房间》和《青草在歌唱》等,而极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更少有从小说最为突出的场景即房子来探讨它,而房子的空间意义正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现实意义之所在。

### 一、《第五个孩子》:一部“小经典”

《第五个孩子》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60到80年代的英国。哈丽叶和戴维结婚后不久,在父母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拥有一座大房子。他们的另一个梦想是拥有一大群孩子,让大房子充满活力。可在生养了4个正常的孩子后,名叫本的第五个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苦恼。本在娘胎

里便暴烈异常,生下后相貌奇丑,沉默寡言,力气惊人,常常表现出施暴的倾向。他杀死家里的猫和狗,伤害自己的兄弟,结果被送到一家私人开办的收容所,险些死在那里。心怀内疚的哈丽叶把他接了回来,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可收效不大。本和一群小混混为伍,最后离家出走。

《第五个孩子》之所以被称为“小经典”,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人曾列出44个关键词,说明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主题。这些关键词包括“抛弃”、“交流”、“家庭关系”、“替罪羊”、“创伤”、“叛逆”等等。更为具体的读解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它看作莱辛在这之前创作的科幻小说的延续。本虽脱胎于文明社会,可他那无法言传的畸形、一身的蛮力和凶暴的本性令人想起R·L·斯蒂文森著名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中通过药物变形而成的海德先生。正是因为这一人性的蜕变,有人把这部小说和玛丽·雪莱的恐怖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笔下的无名怪物相提并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小说暗示,本身体异常、患孤僻症,是因为他的母亲服了医生开的镇静剂,而他却因此而遭到歧视。由此,《第五个孩子》在社会如何对

文

学

刘玉梅,刘玉红  
《第五个孩子》的空间意义

待生理有缺陷的人这方面提出了间接的批评。几乎无人愿意和本交流,包括医生、教师和家人,无人愿意承认出了问题。这说明社会对自己的产物持冷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国内,目前有两篇文章提到《第五个孩子》。《多丽丝·莱辛的新作〈第五个孩子〉痛苦的创作经过》译自美国《纽约时报》对莱辛的采访。张中载教授在《多丽丝·莱辛与〈第五个孩子〉》一文中提出了几种读解视角:计划生育的必要,对“差异”的态度,环境对产生另类的影响。<sup>[2](P79-82)</sup>《当代英国小说》介绍了这部小说,并提出这样的观点:“或许莱辛认为西方青少年犯罪团伙就是在重复人类远祖的野蛮行径,在他们身上生来就带有暴力的基因”。<sup>[1](P281)</sup>

无论把《第五个孩子》看作科幻小说还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无论本的异常是源于基因还是母亲服药造成的后果,以上的评论都忽视了贯穿故事始终的地点——房子——及其在揭示主题上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主题上,《第五个孩子》都是一部空间小说。

## 二、形式上的空间性

《第五个孩子》是一部独特的作品。首先,它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其“叙述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读起来却像一本荒诞小说”。<sup>[1](P280)</sup>一个正常的家庭突然冒出一个怪胎,本的“返祖现象”及其种种异常行为都令常人难以理解。其次,这部小说有别于莱辛其他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莱辛重在表现女性在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以及她们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她“特别关注有创造力的知识女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进退维谷的困境”。<sup>[3](P268)</sup>《第五个孩子》有一明一暗两个主人公。表面上,哈丽叶作为母亲的形象贯穿故事始终,但真正的中心角色是她的第五个儿子本,一个令人害怕和讨厌的怪物。他在母亲腹中的躁动,他出生后的一举一动,他对家庭造成的分崩离析,这些占据了叙述的中心,而哈丽叶成了读者试图理解本的透视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透视镜一直在不同类型的房子中移动,具体而言,小说在地点背景和情节设置上突出了空间性。

### 1. 地点的空间性

空间是整个叙述的主要线索,这是《第五个孩子》的一大特点。故事的地点一直是房子,最主要的是哈丽叶和戴维一家住的大房子,“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小楼,带阁楼,有很多,很多走廊和楼梯平台,还有一个草木繁茂的花园”。<sup>①[4](P8)</sup>从这幢传统风格的大屋,到孩子们从出生到长大依次住过的小房间,到以残酷形式管教本一类孩子的收容所,到哈丽

叶几次去咨询的医生的诊所,这些不同功能、不同性质、具体而实在的空间构成了整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串起所有情节的一根红线。

### 2. 情节结构的时空性

在情节结构上,《第五个孩子》通过淡化时间来突出空间性。米切尔森指出,“当年代被取消或至少被严重淡化时,真正的空间形式终于出现了……时钟的时间——或任何种类的线性时间——并不成为叙述的一个因素。或者,被叙述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是长的,但是又是平静无事的,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sup>[3](P149-150)</sup>在《第五个孩子》中,故事的叙述虽然按线性时间展开,也不时地出现时间标记,但这些标记大都是宽泛的。哈丽叶和戴维在20世纪60年代相识并很快结婚,故事结尾是80年代,第一个孩子生在1966年,其他的孩子出生时也只提年份。更具体的时间是由节日——复活节和圣诞节——来界定的,但它们不断重复。自哈丽叶和戴维这对新婚夫妇搬进大屋后,读者看到的是一次次地过节,一次次的家庭聚会,在这种重复中,时间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起到的只是背景作用。

《第五个孩子》同样符合空间小说特有的桔形结构。戴维·米切尔森在其《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中借用戈特弗里德·本的桔形结构观点来描述空间小说。戈特弗里德认为,表象型小说“是像一个桔子一样来建构的。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具有同等的价值……”米切尔森进一步发挥,他强调,组成空间小说的情节也像桔子的“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些片断“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sup>[5](P142)</sup>由此,他断定,注重对多条线索进行思考的侦探小说和人物个性相对静止的流浪汉小说较好地体现了空间小说的特点。《第五个孩子》在淡化时间的同时,突出了有意义的细节,即桔形结构的“瓣”,它们集中表现作为另类存在的本这一角色:哈丽叶和戴维对大房子和孩子的渴望为故事结局——本将摧毁他们对伊甸园的梦想——埋下讽刺性的伏笔,几个孩子的正常烘托本的异常,节日聚会从热闹到冷清暗示本的力量,本被监禁是文明社会对他的惩罚,其他孩子搬出大房子以及本和他的朋友们对客厅的侵占暗示本取得胜利。为了对本这个真正的主人公作全面而专注的刻画,其他人物被排除了,如包括父亲戴维在内的家庭其他成员,或其重要性大大降低,如作为母亲的哈丽叶。

① 引文均出自多丽丝·莱辛的小说《第五个孩子》(见文末参考文献[4]),国内尚无中译本,所有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译出

### 三、主题的空间性

地点和结构上的空间性最终为主题——空间的暴力——服务。当代社会学强调空间的社会性。法国现代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他认为,空间既是一种实体,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确切地说,它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美国后现代社会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也有类似的想法:“空间本身是基本的,不过它的结构和意义却是社会生产、变化和经验的产物。”<sup>[1](P155)</sup>空间不仅仅是表达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媒介,而且,社会关系也是通过空间建立起来的。虽然索亚讨论的是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不过他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家庭空间。在《第五个孩子》中,家庭作为构成社会大空间的单位空间,体现了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物质空间体现的,换言之,空间是权力的载体,是暴力的工具。

表面看来,这个故事容易令人想起撒旦与伊甸园这一神话原型。在崇尚自由恋爱和性自由的20世纪60年代,哈丽叶和戴维建起了真正的伊甸园:一间大屋子,一对恩爱夫妻,4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喧闹快乐的节日家族聚会,“幸福。幸福的一家。拉维特一家是幸福的一家。”<sup>[4](P22)</sup>本是可怕的撒旦,还在降生前,他的蛮力和躁动便让母亲不得安宁。他的降生犹如撒旦进入伊甸园,他以自己的冷漠、野蛮和邪恶毁坏那里的和平和幸福;他还不到六个月,便从婴儿床里伸出手,扭伤了他的小哥哥保罗的胳膊,之后还不时威胁他,保罗从此一见到自己的弟弟便惊恐地大叫,他成了一直长不大的另一个“畸形儿”。本的暴力情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严重。有个客人送来一只小猎狗,本掐死了它,没多久又杀死了家里的老猫。有一次,他还生吞活剥了一只鸡。因为他,夫妻不和,亲戚们不愿再来过节,兄弟姐妹对他充满憎恨和厌恶。大屋子变得冷清,伊甸园风光不再。然而,仅仅把本视为邪恶的象征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本不是施暴者,而是受害者。他刚出生便受到歧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丑陋,“像头小野兽,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实际上,所有的人——医生、护士、父亲——都不喜欢他”<sup>[4](P49)</sup>他的父亲很快便拒绝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sup>[4](P74)</sup>他成了“可怜的本,无人喜欢的本”<sup>[4](P56)</sup>在这一点上,他和《弗兰肯斯坦》中的无名怪物不无类似之处。两人都因为社会以貌取人而遭人厌恶,他们都被父亲抛弃,被社会放逐。他们都遭受了心理暴力。

对于本这个“不守规矩”的另类孩子而言,心理暴力只是身体暴力的前奏。他在伤害保罗后,开始

长时间地被关在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现在本几乎整天呆在房间里,和囚徒一样。”<sup>[4](P59)</sup>他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交流,家人冷落他,亲戚躲避他。福柯说,禁闭是滥用权力的一种方式,是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sup>[6](P50)</sup>在《第五个孩子》中,哈丽叶和戴维把大屋视为自己的“王国”,<sup>[4](P9)</sup>他们是统治者。虽然戴维坚持让家里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sup>[4](P23)</sup>但是对于他们,房间的意义有天壤之别。对于本的哥哥姐姐这些好孩子而言,拥有自己的房间意味着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拥有归属感;对本来说,他的房间成了他的牢房,“拥有”房间意味着失去自由。其他孩子心中的伊甸园成了他无法逃脱的监狱,本该让儿童体会爱的地方却成为本受规训、受惩罚的工具。再者,本被关在房间里这一状态具有象征意义:他是家庭一员,却被家庭排斥,但又不能到外面的世界去;他被置于里外之间,既不属于家庭,也不属于外界,他成了一个无归无依的存在。

禁闭造成人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和愤怒。本只要一听到锁门声或插销声,立刻吓得大喊大叫,猛踢乱打,无法控制。被锁在房间里的本“几乎整晚站在窗台上,瞪着花园……如果他白天被锁在屋里,他便尖叫,怒嚎,喊声传遍整幢屋子”<sup>[4](P63)</sup>禁闭同样激起人对获得自由的渴望。有时,本会“无缘由地突然跑出去,窜到花园里,然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sup>[4](P63)</sup>在车水马龙中彷徨。

在本被家人送到私人开办的收容所后,禁闭这一空间暴力随之从家庭延伸到社会,而且变得更为严重,它对儿童的伤害甚至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心中有愧的哈丽叶去收容所探望本,却目睹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景象:在一个个小房间里,畸形的孩子躺在床上或垫子上,“一排排的怪物,几乎都在睡觉,一片沉寂。他们确被药物弄得神志不清。是的,几乎一片沉寂;只有一张床垫上传来沉闷的抽泣声,床垫罩在毯子下。更近的地方不时响起尖利的喊叫,仍在刺激着她的神经。大便的气味比消毒剂更强烈。”<sup>[4](P81)</sup>最后,她见到了濒临死亡的本,他“全身赤裸,被捆在紧身衣里,昏迷不醒,浅黄的舌头伸出来,皮肉一片死白,白中透绿。墙壁、地板和本身上沾满了粪便,一摊深黄色的尿液从草垫下渗出来,把草垫浸湿了”<sup>[4](P82)</sup>这一场面例证了福柯的观点,即“监禁采取了‘剥夺自由’的简单形式,在一个自由受到推崇、自由属于一切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感向往自由的社会里,监禁怎么会不成为典型的刑罚呢?这是因为失去自由对一切人都是同样重要的。”<sup>[7](P260)</sup>这里的“一切人”自然包括孩子,实际上,孩子生性率真,视自由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他们一旦受到身体上和活动上的无情束缚,相比

成人而言,更加触目惊心。

禁闭这一持久的暴力似乎收到了一些效果,本回到家后,终于有了一点文明人的样子,他学会和家人同桌吃饭,知道嘴里有饭菜时不能说话,也不能张大嘴吃饭,甚至学会和家人进行简单的话语交流。但是,他在情感上依然无法和家人沟通,妈妈晚上和他的哥哥姐姐拥抱道晚安时,本“有几次走到门前,瞪着这一情景,他搞不懂这一切”。<sup>[4](P95)</sup>一方面,他依然被排斥在亲情之外。另一方面,他无法理解这个“文明社会”,更谈不上融入其中。这说明,以禁闭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是失败的。

禁闭和规训不但未能把本改造成文明人,反而将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反叛者。在《第五个孩子》的空间里,权力的暴力导致叛逆的暴力。福柯说:“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阻力。”这阻力就是反抗。他解释道:“我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实体。我只是说: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sup>[8](P46)</sup>哈丽叶的家庭医生布莱特先生断言:本是一个真正的摔跤手,他出生,就是为了和整个世界战斗”。<sup>[4](P48)</sup>本在行动之前,他作为最终将取得胜利的反叛力量已经有了暗示:“不止一次,哈丽叶醒来,看到本无声地站在阴影中,瞪着他们。花园的暗影投射在天花板上,大大的房间没入到昏暗中。这个小怪物就站在那儿,半隐半现。”<sup>[4](P96)</sup>本在家里受到监禁,但他最终把这监狱变成自己心中的伊甸园。在故事将近结尾,本领着一群小混混回到家里,“他们整个下午,整个晚上东歪西倒地躺在那里,喝茶,扫荡冰箱,出去买馅饼、薯条或比萨……他们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晚上的暴力片:枪战、谋杀、折磨和斗殴,他们就喜欢这个。”<sup>[4](P122)</sup>他们有时甚至在客厅里过夜。客厅是哈丽叶一家过节聚会的主要场所,是幸福美满的象征,这时它已经被占领,被颠覆。有人认为像哈丽叶一家这样的“好人”可以躲开外部世界的动乱和暴力,但躲不开家庭里的混乱。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本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家里,而从前的统治者和教育者——他的母亲哈丽叶——只能躲在厨房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本已经成为一个青少年犯罪团伙的头领,成天在伦敦的贫民窟制造是非。这表明,外面的动乱和家里的混乱已经不分彼此,相互映衬。本离家不久,哈丽叶便会在报上读到有关拦路抢劫、入室盗窃一类的犯罪的报道。这一暗示很明显:本和他的朋友漂泊到了城市里,消失在那里的底层社会中,在斗殴和暴乱中寻找刺激。本在家里取得象征性的胜利后,走向城市,他以犯罪对抗这个文明世界。

## 四、结语

空间及其意义一直是莱辛关注的主题。她的《金色笔记本》、《四门之城》(1969)和《简述堕入地狱的经历》(1971)描绘人失去心理平衡后的精神危机,莱辛把它们称为“内心空间小说”,其中《简述堕入地狱的经历》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学教授在幻想中乘飞船遨游四海,这似乎预示着莱辛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的一系列宇宙空间小说。这些科幻小说将莱辛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世界未来的忧虑带到了外空间。后来,她还和菲利浦·格拉斯合作,把自己的科幻小说《8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改编成一出“空间歌剧”。<sup>[1](P280)</sup>《第五个孩子》中的不同房子把莱辛的空间视野延伸到现实世界的“内空间”,探索这一空间里的权力与惩罚、叛逆与斗争的关系。伊甸园是一种幻觉,它并不存在,文明是残酷的,在权力和改造的外衣下,它与兽性有相通之处。莱辛对自己的出版商说,“这是一个恐怖故事,我觉得它是一个经典的恐怖故事。”故事结尾,本离开家,哈丽叶怀疑“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张和自己相似的面孔”,<sup>[4](P133)</sup>而她只能面对空无一人的大房子。如果说这是一个恐怖故事,那么这种恐怖是现实的,它说明,文明社会同样会产生怪物,而恶徒,则是对社会教化的质疑。?

## [参考文献]

- [1]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2]张中载.多丽丝·莱辛与《第五个孩子》[J].外国文化,1993,(6).
- [3]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A].(美)约瑟夫·弗兰克,等著,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4]Doris Lessing, The Fifth Child[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 [5]Victor E. Taylor and Charles E. Winquist ed.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M].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6](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7]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4.
- [8]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收稿日期 2008-02-02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刘玉梅(1973~),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西桂林,邮编:541004。刘玉红(1969~),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广西桂林,邮编:541004。